

# 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章毅君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新中国之加入联合国, 既是中国政府坚持斗争、反霸权、反“两个中国”图谋的成果, 也是当时操控着联合国的美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调整其全球战略的结果。这样的大是大非背景也预示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还需要双方付出更多的努力。

(关键词) 中美关系; 联合国; 战略博弈

(中图分类号) D8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5) 01-0164-07

新中国成立后, 中美两国围绕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长期博弈。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美国对华战略经历了从孤立遏制到缓和的转变, 中国的外交战略则呈现出从“一边倒”到“反两霸”再到转向“一条线”的曲折交替。在这一过程中, 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最终促使中美双方结束彼此长期对峙的局面, 谋求两国关系的缓和, 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正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结果。

## 一、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经过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便提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外交目标。11 月 15 日, 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 4 届联大主席罗慕洛, 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sup>[1]</sup> 中国的要求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苏联的立场相对立,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声称, 因为

“该政府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sup>[2]</sup> 美国仍同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 因而反对驱逐蒋介石集团授权的代表, 但认为这一问题是程序性问题, 可以由简单多数决定, 美国将不行使否决权。1950 年 1 月 8 日, 周恩来致电安理会, 强调国民党集团的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 主张将其从安理会中开除出去。<sup>[3]</sup> 苏联再次声明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 在 1 月 10 日的安理会会议上提出驱蒋提案, 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并不代表中国, 要求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驱逐出去, 并声明在安理会开除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美国反对苏联的提案, 1 月 12 日, 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葛罗斯发表声明称, “苏联的提案给安理会提出了一个涉及成员国席位证书的程序性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反对这一动议的投票不能视为否决票, 即使假设有 7 个安理会成员对其投赞成票的情况下, ……美国会接受安理会就此事做出的决定”。<sup>[4]</sup> 这表明美国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 反对在安理会或联合国任何机构中给予新中国代

(收稿日期) 2014-09-17

(作者简介) 章毅君 (1965—), 女, 天津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表权。由于美国的操纵，1月13日苏联提案在安理会表决时遭到否决。为了表示抗议，苏联代表团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sup>[5]</sup>

朝鲜战争爆发后，8月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并担任当月的轮值主席。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在朝鲜战争期间“以任何形式提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sup>[6] [P.64]</sup> 8月1日安理会召开会议，苏联代表以会议主席身份裁定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不能代表中国，因此不能参加安理会的讨论。美国代表立即表示抗议，反对此问题由主席裁定并获得了通过。随后在1950年9月第5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了有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但均被美国带头否决。根据加拿大和古巴的提案，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在大会对这一报告做出决议之前，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相同的权力。美国操纵了这个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在1951年10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在当前的情况下“未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任何建议”。

此后10年，美国采用“暂缓讨论”的策略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一直没有列入联大议程，以此将新中国挡在联合国大门之外。

从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国不断增加，到1960年成员国数已经达到98个，同时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国家不断增加。在1960年第15届联大会议上，虽然以42票赞成、34票反对、22票弃权通过了“暂缓讨论”议案，但赞成票与反对票的差额只有8票。同第14届联大相比，赞成票减少了2票，弃权票从9票增加到22票，其中就包括14个非洲国家。原来一向追随美国的加拿大、英国和巴西等国也纷纷表示将改变立场，赞成讨论这一问题。显然美国的拖延策略将难以为继。

1961年9月，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议程，从而突破了美国设置的障碍。面对这一失败，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改变策略，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提上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同时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宪章第18条所规定的“重要问题”，需要联大2/3的多数通过

才能变更。根据这一策略，在1961年第16届联大上，美国提出了“重要问题”议案并获得通过。这项议案规定，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都属于宪章规定的“重要问题”，需要大会2/3的多数赞成票才能通过。此后，美国坚持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所谓的“重要问题”每年在联大提出来，目的是想继续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0年11月第25届联大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投票，“重要问题”提案获得通过，同时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提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在8年来首次获得多数票。美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多年来以“重要问题案”反对“阿尔巴尼亚案”的策略已经行不通，不仅将使美国与主要盟友的关系出现裂痕，而且在美国国内也将遭到反对，同时还将促使“阿尔巴尼亚提案”更早通过，从而使得美国的国际声望受损。<sup>[8]</sup>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开辟了空间。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宣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为此，美国提出了“逆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根据会议程序，首先对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投票，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这预示着极力保留台湾联合国席位努力即将破产。台湾国民党代表周书楷遂被迫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随后，大会开始对阿尔巴尼亚提案进行投票，该提案最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而“双重代表权提案”未经表决即成废案。至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 二、关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中、美心路

(一) 美国从遏制共产主义向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战略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格局。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展开，美国将对华政策纳入其全球战略加以考虑。1948年12月，美国提出了在远东的总战略，美国的“目标就是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遏制和降低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使之不致威胁美国的安全”。<sup>[6] [P.12]</sup> 面对新中国的建立，美国不但继续承认逃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而且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反对新中国取代蒋介石集团拥有在联合国的席位。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武装侵入台湾海峡。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和影响之下。不仅如此，美国从反共的意识形态出发，企图从战略上围堵新中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建立起了一条遏制线。美国与一系列国家签订了军事条约，如《日美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日共同防御援助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形成了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构成了长期的威胁。这样，美国把遏制与孤立中国作为其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作为一项长期政策确定下来。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时，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基辛格指出，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阵线分明的两极世界已开始让位于一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sup>[9] [P.596]</sup> 1971年7月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讲中，也阐明了他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他说，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苏联、日本和共产党中国。这五大力量将决定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世界在其他方面的未来。尼克松指出，相互制衡而非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即构成一种均衡，那么就将是“一个更为安全、更为美好的世界。基辛格提出在“总体均势得到维持”的情况下，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应该从“一种僵化的认知转向一种灵活认知”，美国不应、也不可能承担“确保全球平衡的独一无二的责任”。为了更现实地认知当今的国际体系，美国有可能与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但其地缘政治利益在某些方面（包括生存、

安全和适宜的国际环境等）与美国相关的国家改善关系，甚至结盟。同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美国防务政策的重心从追求“优势”转向保持“充足”。<sup>[10]</sup> 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对待国家利益要用地缘政治思维取代冷战意识形态的主导，根据自身有限的战略资源，制定现实的、理性的对外战略。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冷战战略，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遂成为尼克松外交战略的重点。

尼克松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政府对外政策报告中便强调“如果没有中国以及其拥有的七亿人民的参与，任何一个国际制度要想得以维持，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sup>[11]</sup> 而中苏关系恶化及1969年3月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为美国实行灵活的外交战略提供了一个契机，尼克松政府决定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做出了和解的姿态。<sup>[7] [P.225-226]</sup> 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公开表示“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去。”<sup>[9] [P.632]</sup> 10月下旬，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访美的宴会上尼克松公开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

中国方面也表达了同美国和解的信号。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友好人士、记者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游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sup>[12]</sup> 1971年4月7日，中国主动邀请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sup>[13]</sup> 在中国“乒乓外交”的鼓舞下，尼克松明确表示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他的政府已经并还将为此而努力。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飞抵北京。7月15日，中美同时发表了基辛格访华公告。中美谋求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由敌对走向和解的重大转变，对当时国际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二）朝鲜战争后中国对联合国态度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曾努力争取获得联合国的承认，1953年10月中国被迫出兵朝鲜，中国同美国成为交战的双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进程出现了曲折。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对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通过污蔑中国“侵略”朝鲜和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感到愤怒与失望。中国政府指出“联合国已日益不可挽救地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sup>[14]</sup>此后几年间，联合国又通过了一系列诬陷中国的提案。如1955年中国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岛屿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调集军队入侵台湾海峡进行干预，在其授意下，安理会出现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提案”。对此，周恩来总理表示，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的”。<sup>[15]</sup>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印尼总统苏加诺谈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时说，“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我们觉得慢一点好”。毛泽东表示中国不急于进入联合国，因为在联合国里面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他们。<sup>[15] [P. 264]</sup>1967年6月，周恩来总理也表示：“亚非许多友好国家可以在联合国内斗争，中国则在联合国外进行斗争。”<sup>[16]</sup>可见，在中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到60年代随着新的国际力量的出现，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广大亚非拉国家和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之相抗衡的国际力量。因此，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之外，结成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同美苏进行斗争。鉴于联合国日益成为美苏争夺对抗的场所，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捉襟见肘，因此中国对联合国更加怀疑与不满。1965年1月，周恩来总理指出“联合国必须改正它的错误”。他甚至主张“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与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唱对台戏。<sup>[17]</sup>1965年9月，外交部长陈毅也表示“联合国必须纠正错误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改造。联合国要承认和纠正它过去的一切错误，包括取消谴责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并且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是侵略者；联合国宪章要由全世界大小国家来共同重新审定，所有的独立国家都应该包括在联合国，帝国主义的一切

傀儡都要驱逐出去。”<sup>[18]</sup>直到1967年6月，中国领导人仍表示，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的联合国的可能性在日益增长。<sup>[19]</sup>

(三) 中国反对美国在代表权问题上的“两个中国”图谋

美国决策者在制定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过程中，始终强调对台湾因素的着重考虑。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和退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立场一致，反对新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之所以承认和支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认为台湾是其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盟友，是“美国远东防御体系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要使台湾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sup>[20]</sup>为此，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不断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1953年1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美国并非永远反对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可能共产党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国民党中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1954年10月杜勒斯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密件中建议，“我们对中国和台湾采取的政策，应当同我们正在德国和朝鲜奉行的政策属于同一类型”，表示他希望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分裂状态能长期持续下去。<sup>[21]</sup>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建议深表赞同。1955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把福摩萨（指台湾）和红色中国看做是分开来的独立国家的办法，是“不断加以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之一”。<sup>[9] [P. 310]</sup>

中国意识到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多种场合给以揭露和谴责。1955年2月，周恩来指出，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就是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已经在英国、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公开讨论。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有些人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sup>[22] [P. 10 P. 225]</sup>9月，毛泽东指出，“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

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12] (P. 267 P. 268 P. 287) 1957年11月，周恩来在同各国驻华使节的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绝对不能容许在国际组织中出现“两个中国”。“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中，如果出现‘两个中国’，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还有其他‘中国’，……我们宁可不参加。参加了就是默认，默许其存在”。<sup>[22]</sup> (P. 253 P. 257) 这些谈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图谋。

50年代末60年代初，鉴于“暂缓讨论”政策已经穷途末路，肯尼迪政府提出了“继承国”方案。所谓“继承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都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创始会员国“中国”的“继承国”，因此，“北平政权”和“台湾政权”可以同时联合国大会拥有席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取代“中华民国”并拥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两个中国”的思想，立即遭到海峡两岸的坚决反对。1965年第20届联大期间，各国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联大的投票结果是，美国支持的“重要问题”提案仅以7票多数通过，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虽以47票赞成、47票反对、20弃权票被否决，但赞成票与反对票第一次出现了持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再次提出“两个中国”的方案。1966年5月1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给总统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建议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转向“两个中国”方案。腊斯克认为，如果仍继续使用很多盟国已不再支持的“重要问题”提案，台湾的席位有可能会被中共取代，从而给美国内外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可采取“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他提议，“在确保中华民国席位的同时，考虑共产党中国拥有席位的可能性”，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遭到北京反对，从而可以继续把北京排除在联合国之外。<sup>[23]</sup>然而，此时的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国内局面一片混乱，美国在代表权问题上继续支持原来的“重要问题”提案。

与尼克松政府对华缓和政策相适应，美国在

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开始发生变化，把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改变为反对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为此，美国提出了“逆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并准备将其酝酿了20年之久的“两个中国”政策在联合国付诸实施。当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就“双重代表权”问题试探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把重新获得联合国席位问题看作一个急迫的问题，中国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安排。毛泽东指出，“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sup>[24]</sup>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与完整。

### 三、世界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20世纪后半期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由对抗到缓和的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承认逃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对大陆共产党政权实行遏制与孤立的政策，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反对新中国取代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政府决定“一边倒”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必然选择，与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高度契合，因而使得中美战略关系呈现出一种相互敌视和对抗的状态。

随着国际形势以及美苏冷战态势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战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美国方面，因受越南战争的困扰，其对外战略受到极大牵制，尼克松政府想尽快地、“体面地”从越战的泥潭脱身。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被美苏核均势现状取而代之，并且苏联积极推行南下战略，同美国争夺第三世界。而美国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则受到来自西欧和日本的强烈挑战。同时，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有鉴于此，尼克松政府实行战略收缩，改变对华政策的僵硬立场，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尼克松认为，中美关系缓和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对苏联打“中国牌”，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做出让步，使苏联在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位置，从而达到制衡苏联维持美苏战略均势的目的。

中国方面,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由于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中国逐渐走上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反两霸”成为6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主旋律。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展开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并努力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外交,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到60年代末,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更为直接和迫切。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边界摩擦事件,频繁侵犯中国领土领空。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了直接武装冲突。苏联还筹划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中国,并扬言要袭击中国的核设施,使中国国家安全承受着巨大压力。此时美国深陷越战困境,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减少了从西南方向对中国的威胁。毛泽东明确指出,

“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中国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外交大战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开创性发展时期。“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sup>[25]</sup>

共同的安全利益促使中美两国调整本国的外交战略,从长达22年的敌对状态走向缓和。中美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的转变,是双方跨越意识形态分歧,重新界定国家利益,注重地缘战略利益的结果。正如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所说,“中国和美国一道进行‘长征’,不是步伐一致,而是在通往相同目标的路上前进”。<sup>[26]</sup>后来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曲曲折折也似乎印证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和大怨,必有余怨”这一哲理。

#### (参 考 文 献)

- (1)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Z].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4-6.
- (2) 谢益显. 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0.
- (3) 裴坚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67.
- (4) The Deputy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Gro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 *FRUS, 1950, Vol. II,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p. 238-243.
- (5) 李铁城. 联合国五十年[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411.
- (6)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4.
- (7) [美]基辛格.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51.
- (8) 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S]. *FRUS, 1969-1976, Vol. V, United Nations, 1969-1972*, pp. 614-628.
- (9) 资中筠.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96.
- (10) 【美】约翰·加迪斯(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 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292-298.
- (11) 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329.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C].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93.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51.
- (14) 外交部发言人斥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中国朝禁运案的谈话[A].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2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27.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439.
- (16) 周恩来总理在非洲国家使节欢迎卡翁达总统的宴会上讲话[N]. 人民日报,1967-06-25-01.
- (17) 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J]. 世界知识,1965(3):2.
- (18)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谈话[N]. 人民日报,1965-10-07-01.
- (19) 赵磊. 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1949—1971[J]. 外交评论,2005(6).
- (20) 陶文钊,牛军.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C],171.

- (21) 王缉思. 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 [J]. 世界历史, 1987 (3): 67.
-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23)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 [S]. May 14, 1966, *FRUS*, 1964 - 1968, Vol. XXX, *China*, pp. 301 - 303.
- (24) 熊向晖.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过程 [J]. 百年潮, 1997 (1): 6.
- (25) 章百家. 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1).
- (26) 【美】埃尔默·普利施科. 首脑外交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354.

## On Sino-American Strategic Game in Perspective of China's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ZHANG Yi-ju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China's joi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both the resul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sisting of fighting against hegemony and the conspiracy of "Two Chinas" and also the result of readjustment of global strategy of America out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 which then had the contro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background of major issues of right and wrong signals that more bilateral efforts are needed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Nations; strategic game

(责任编辑 李 劼)